

本期看点

海南岛历史上存在过“琼州”、“崖州”、“儋州”、“万(安)州”、“振州”、“忠州”、“南建州”,很少有人听说过“镇州”;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,“镇州”在宋代还一度是海南的政治和军事中心,尽管这一功能延续的时间并不长。为了弄清“镇州”的立废原委,本报记者近日查阅了大量史料,并与专家一起到现场发掘、考察古镇州遗址,以期更多地将古代“镇州”的历史面貌呈现给读者。

“镇州”二字,是记者在查看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李勃教授的《海南岛历代建置沿革考》一书时,偶然间发现的,觉得十分好奇,因为此前从未听说过海南历史上还存在过“镇州”。李勃教授早在2004年便在中国历史地理论坛上,发表了《唐代赵昌进琼管等(六州六十二洞归降图)考》一文,考据出唐代时“镇州”已经设立,不过学术界历来认为“镇州”始建于宋代而不是唐代。



次到实地采访,并将采集到的文物残片送到省博物馆和海口市博物馆,请文物考古专家鉴定。

唯一保存土墙的海南古城遗址

近日,记者邀请李勃教授和我省文史专家王俞春先生,第一次来到位于东方市八所城区约40公里外的中方村,村里不少年老的村民都知道遗址的事,都说那是“古镇州”,然后一边带路一边告诉记者:早在1969年的时候,中方村的百姓在城里垦荒耕地时,意外地挖到了带字的瓦片和一批铁制的犁头、斧头、钩镰、四齿耙和锄头,还有一枚陶制的烟嘴。

走到中方村北边不到1里处的城址,只见这座呈正方形的古城遗址,土墙依然存在,尽管城里城外已被大量的芒果树、桉树和各种灌木所覆盖,但其轮廓还是十分清晰。在古城里,中方村81岁的符保英老人向记者介绍了每堵城墙的长度都是200米,这是村民前些年分地种果树时细心丈量过的。

几天之后,记者又邀请海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的阎根齐研究员,再次走进东方市东河镇中方村北面的“古镇州”城址,同行的还有东方市博物馆馆长、文物管理所所长黄扬琼。

走完城址的四道城墙后,记者一行发现该城址的土墙底部宽约10米,顶部宽约2米,高度在1米至6米不等,城墙拐角处则更高更厚。从事文物考古和鉴定工作多年的阎根齐认为,可能当年城的四角建有起着瞭望作用的角度。

阎根齐查看现场后,表示这是海南已发现的古城遗址中,唯一完整保存土墙的城址;而如果村民所说的古城有4个城门属实的话,那么,这也是唯一一座四门城池,因为海南的古城遗址,像海口府城、定安古城和琼中水会所城等,都只有东、南、西3个城门,而没有北门,其间奥秘非常值得研究和探讨。

在“古镇州”城址内部,阎根齐研究员还发现整个城池的地势北高南低,认为北部极有可能是衙署的所在位置,因为符合

海南古代州府 镇州:鲜为人知的

本报记者 陈耿 特约记者 卞王玉珏

中国古代建筑的布局特点,城里还可能有通道、兵营和宿舍等设施,不过这些推测都需要考古发掘来验证。在城里一些裸露的地面上,可见许多厚度和大小不一的砖瓦碎片,阎根齐研究员仔细察看说,不少板瓦的内面有着细致的最早出现于汉代的“布纹”,有些是“绳纹”。

“那么,难道古城设立的时间要向前推到汉代?”记者问。阎根齐说:“那不一定,虽然‘布纹’和‘绳纹’是汉代陶瓷的显著特征,但在烧陶技术相对滞后的海南岛,唐宋时期也有可能沿用这一技术。”

不过,阎根齐比较肯定的是:“这座城址

曾是宋代海南政治军事中心

东方市博物馆馆长黄扬琼则告诉记者,1984年10月16日,原东方黎族自治县文物普查队在这里调查时,曾在城址西边的一块菜园里,出土了一个宋代大陶瓮,里面装有一批宋代兵器和生产工具,经考证是古镇州被废时埋入地下的,但这批文物由于严重受潮,已是锈迹斑斑。

回到八所后,记者很想一睹当年镇州的出土文物,但黄扬琼遗憾地对记者说,由于东方市文物管理所近期要迁移,所有历史文物已被“打包”,暂时不好重新打开供参观。

1986年,古镇州城址被列为东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,始建年代暂时被确定为宋代,1998年申报省级文保,但至今尚未得到批复。

据《宋会要辑稿》和《宋史》记载:“镇州”设立于北宋大观元年(1107年),并将原先设在琼州的海南最高行政和军事机构——“琼管安抚司”移驻到此,镇州于是成为海南的政治和军事中心;但到了政和元年(1111年),镇州存在4年之后便被废除,其属地拨归琼州管辖,海南的政治军事中心又回归琼北。

关于宋代“镇州”,正史和方志中还有一些零星记载。《续资治通鉴》记载:宋徽宗大观元年,“建镇州于黎母山心,赐军额曰靖海。用知桂州王祖道策也。”原来,镇州的设立源于桂州(今广西桂林)知州王祖道向朝廷提出的建议,理由是:黎人“今愿为王民”(《宋史·王祖道传》),也就是说因为黎族百姓愿意归服宋朝统治。

宋代镇州设立的原因还有说法。万历《儋州志》称:“宋大观一年,提刑王公祖道渡海观风,谓黎地广袤,都邑稀疏,奏请立镇州于深黎,地名龙门。”按此说法,宋朝设立镇州是因为黎族聚居地区面积广阔,但行政管理机构太少,需要加强统治。

根据正史和方志的相关记载,宋代镇州设立的原因总算是厘清了脉络,但为何何存在4年便被废弃呢?对于这一点,史籍中的记录更是少之又少。宋人王象之的《舆地纪胜》说是:“大观三年(注:应为一年),王尚书祖道奏于山心龙门设镇州,以龙门名县,移琼管司在镇。四年,丁兵死,遂废,复以琼管司归琼州。”但“丁兵”如何和为何“死损”,书中却没有详细阐述。

《宋会要辑稿》中的这样一段记述也许最能说明镇州被废的原因:“出差货物不多,并深在黎峒,中间别无人旅往还。”物流不发达,而且深处黎族山区,人流量也不多,应是镇州被废的原因之一。

需要说明的是:《宋会要辑稿》是清代徐松根据《永乐大典》中收录的宋代官修《宋会要》加以辑录而成,内容丰富,十之七八为《宋史》各志所无,是研究宋朝法律典制的重要资料,可信度比较高。

“唐城”还是“宋城”? 期待解密

在纷繁芜杂的史料中,精于考据的李勃教授虽然坚持“镇州”始设于唐代的观点,但至今尚未找到有关唐代“镇州”设置和罢废



的确切信息,比如说设立原因和具体时间等,不过他从未从《宋会要辑稿》的“镇州,大观元年建,仍为龙门郡,下部都督府。”这段文字中,看出了一些端倪,因为“仍”字有沿袭的意思,说明此前就已存在过“龙门郡”。(龙门郡是镇州的别称)

李勃说,《旧唐书》还明确记载:唐宪宗元和二年(807年),“岭南节度使赵昌进琼管儋、振、万安六州(六十二洞归降图)”。在唐代元和二年之前,海南有籍可考的“州”,只有崖、琼、儋、振、万安五州,怎么会有六州?可见在赵昌进图当年或稍前,“镇州”便已设立,时间大约是806年或807年。李勃教授的观点还在海南的方志里找到了印证。明代万历《琼州府志》有这样的记载:“唐都督府,凡二:镇州都督府,在感恩县境,今陷黎峒;琼州都督府,治城中,在今旧州。”

但是,阎根齐研究员认为,要弄清“镇州”的始建年代是否唐代,除了史料文献考证,还需要更多的出土文物来佐证。因此,他建议有关部门向国家文物局提出申请,对“古镇州”城址进行考古发掘,然后邀请各领域专家召开论证会,以揭开古城之谜。

据悉,近日东方市文物局将请省博物馆的郝思德研究员等专家,到该州指导文物普查工作,届时他们将到“古镇州”城址开展一些试探性发掘工作。期待考古专家的专业性寻访,能带来让人振奋的消息。



古镇州早已淹没在岁月的时光中



通往古镇州城址的道路是狭窄的田畦



古州城南墙外的水道遗迹



文史专家实地了解“古镇州”故事



本栏图片由本报记者 苏建强、陈耿 摄

改革开放三十年·亲历

海南第一代股民老莫回忆当年炒股经历——“老五家”牵动人心

本报记者 魏如松

秋意正浓,记者日前在海口府城忠介路茶馆内见到了莫维健,他手中紧握着两本当年用于股票交易的证本,自豪地向记者回忆当年海南第一代股民买卖股票的往事。

府城最早的股民

老莫今年50多岁,谈起海南最早的证券市场,他显得异常兴奋:“早在1991年,海南股份制改革的浪潮就在整个琼岛翻涌,股票这个词在那时相当时髦。”

当年,老莫的妻子洪文转在海南化纤厂工作,作为试点单位之一,厂里给每个职工配发6000股原始股。

在那个年代,股票对大多数人来说还是个新生事物,洪文转也有疑惑。而在1988年4月份,报纸上刊登了中国将开放国库券交易的消息,老莫敏锐地捕捉了这一信息,在实践中小有斩获。买卖国库券的成功,让老莫对股票交易充满信心,他说:“妻子,买下海南化纤6000股原始股,成了府城最早的股民。”

海南企业内部发行股票,与海南省股份制试点领导小组及其日常工作机构——海南企业上市办密切相关。

老莫告诉记者:“当时,内部发行股票的企业规模很大。海南化纤工业股份有限公司、海南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、海南港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、海南珠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和海南民源现代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,这5家企业均为省内大中型企业。”

炒股每天骑车40分钟

老莫清楚地记得,1988年10月,海南省证券公司成立,这是当时海南唯一的一家专营证券业务的公司。1991年底,该公司开始在海南代理买卖深圳股票。“我第一次去海秀路金山大厦一层证券公司营业部,是被一个老朋友带去的,当时营业部布置十分简单,在墙上挂着一个小白板,用粉笔写着每日股票的开市价和成交价。”

早在建省前的1984年,海南就发行过股票,但提起海南的证券市场,人们想到最多的仍是1992年前后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海南“老五家”。

“琼能源、琼化纤、琼珠江、港澳实业、琼民源,这是我省异地上市的第一批企业。1991年,海口炒股的股民不及百人,都集中在金山大厦营业厅内。我家住在府城,每天骑车40分钟才能到那里。”老莫说。



海南第一代炒股人用于股票交易的证本

如今,不少股民早已足不出户,坐在家中炒股,老莫说:“当时信息技术没有现在发达,股民想要了解股票价格,只有通过传真获取。电传的内容也很简单,远没有现在通过网络获得的信息多。”

时隔两年后,也就是1993年,海口股票市场异常活跃。老莫记得当时港澳公司发行认购证时的狂热景象:“港澳公司发行认购证时,成千上万的人涌入该公司位于滨海新村的驻地。按照规定,每人限购10张认购证,所以就出现了全家老小齐上阵的火爆场面,排队等候的人群还曾一度把玻璃窗挤裂。”

股票火爆,人们仿佛看到了一个个“造富神话”,“当时进行柜台交易,要根据每天报来的人数确定开市价格,焦急等待消息的人们聚集在金山大厦内,人头攒动,熙熙攘攘。”

1994年,因家中急需用钱,老莫卖掉了手中的股票,如今已过知天命之年的老莫早已不再炒股,但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股市的发展,仍感慨万千:“没有什么能比股票更能牵动人心,它能一夜之间造就亿万富翁,也能让人一夜之间倾家荡产,多少喜怒哀乐因它而起……”

如今,炒股就像吃饭、睡觉一样,成为很多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事情。中国的股市也早已褪去神秘的面纱,不断走向正规,成为老百姓投资理财的重要渠道。

三亚渔民林鸿永讲述:从一条渔船到一支船队



三亚市河西区榆港社区渔丰合作社理事林鸿永。本报记者 郭景水 摄

讲述者:林鸿永 记者:本报记者 郭景水 1972年,16岁的我开始一个人出海捕鱼。1980年,我拥有了自己的第一艘渔船,而现在的我担任着三亚第一个专业渔业合作社的理事长,我所带领的三亚渔丰专业合作社旗下有18艘钢质围网渔船。过去的30年,捕鱼的话术没有变,捕鱼的方法和工具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,从一个人到一支船队,个中甘苦自知。

1993年,我拥有了自己的木船

1970年代,我还是崖县南海公社榆港大队的社员,16岁开始了四处耕海牧渔的生活。直到1980年,我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第一艘渔船。那时候技术比较落后,只能在近海的陵水、文昌等海域捕鱼。因为当时渔船上的海上通讯工具比较简单,只有对讲机、收音机等设备。但是一个人驾船捕捞,练就了一身胆量和本领,也让一些有本事的渔民实力大增。

1993年,海南建省第六年,我终于拥有了一条50吨级的自己的木船。那时三亚的许多渔民还盯着近海。但是只要气候允许,我就会和几个朋友一起结伴去更远的海面捕捞,甚至跑到西沙。当时在西沙起网的时候,一网的鱼活蹦乱跳,一辈子都不会忘记。

但是木船有一个致命的弱点,那就是承载量有限,稍遇恶劣天气就面临风险,几乎没有任何的抗风能力。那个时候,我的梦想就是可以拥有一条铁船。

政府采纳了普通渔民的意见

2003年10月,获知三亚市有关部门进行“百吨渔船计划”,我就跑去去询问。不过一问才知道,百吨渔船居然还是木头制造,当时有点遗憾。1个月后,我特地赶到广东

阳江,看当地造出来的第一条钢质的围网渔船。当时越看越眼馋,心想我们不能走回头路,要建议政府部门搞就搞钢船,不要搞木船了。我们没有想到的是,三亚政府部门很快就采纳了我们这些普通渔民提出的建议。2004年初,三亚市造出了全市第一批钢质渔船。看到自己的理想变成了现实,我就站出来承租钢质渔船。驾上了钢质渔船,我捕捞的劲头更大了,效益也是节节攀升。一年后,我请自己的舅舅出手,再租一条船。到了2006年7月,我又承包了5条钢船。

合作社打造出捕捞船队

一个人致富不算光荣,带领大家一起致富才见本领。2007年6月,在三亚市政府有关部门支持下,河西区榆港社区渔丰合作社成立,我们有14名渔民成为合作社的首批注册社员。我担任合作社理事长,合作社一共租赁了13艘钢质围网渔船。规模发展的道路让更多的人尝到了甜头。当年11月,合作社规模进一步扩大,增加了5名注册社员,又承租了5条钢质围网渔船。

合作社把一种形单影只的捕捞船打造成了捕捞船队。如今,合作社一年的捕捞总产值超过1700万元,是原来18艘船单船作业之和的3倍。另外,每艘船每月3.5万元的租金,合作社一次也没有拖欠过。在收入上,合作社也走在了前面。渔汛旺季时,每艘船上的船员平均月工资超过8000元,比三亚市同期单干渔船船员收入高10%-15%。

尽管发展的速度很快,不过说到底还是要感谢政府——因为100个林鸿永也造不起18条每条约值250万元的钢船。我现在又有新的计划:一是想给钢船加装制冰机,这样可以更长久地保鲜渔货;二是建造一艘补给船,辅助捕捞船向远洋继续进发。

王祖道是《宋史》和其它方志、地理志中提到的请设镇州之人,他是怎样的人物呢?据查,王祖道字若愚,福州人;1065年考中进士,当过汀州、泉州、福州和桂州知府,任福建提刑按察使时曾巡视各郡县;官至刑部尚书,大观二年(1108年)死于任上,也就是他奏请设立镇州的第二年。

记者翻阅了《宋史》中的《王祖道传》,该传记对他的评价并不高。王祖道在宋徽宗身边当过“谏官”,但宋徽宗认为他的计策没有什么可取之处,大多是人云亦云,于是将他派遣到地方去。王祖道任4年桂州(今广西桂林)知州时,曾投入大量财力和物力欺压当地少数民族,他建城设县,调兵镇戍,源源不断地向内地运送征调来的钱、布、盐、粟等财物;后来瘴疠横行,王祖道对镇守边疆的士兵也不闻不问,以致死者有五六,“实无尺地一民益于县官”!

王祖道在广西当不好官也就罢了,还插

乍立乍废皆因一人 王祖道和古镇州

本报记者 陈耿 特约记者 卞王玉珏

手管起海南的事情来。他向朝廷奏称:“黎人为患六十年,道路不通。今愿为王民,得地千五百里。”于是奏请设立“镇州”。由于所谓的开拓疆土有功,因此他被擢升为“龙图阁直学士”。原来,宋徽宗登基后,重用奸相蔡京,蔡京想以开边来巩固受宠地位,王祖道便极力迎合蔡京,终于获取到了功名。

尔后,王祖道又被召回京师任兵部尚书,但他并不急着赴任,而是唆使另一州府的长官上奏朝廷,说是“海南一千二十峒皆已团结,所未得者百七十峒,今黎人款化,则未得者才十之一耳”。此举惹恼了黎族首领,他们揭竿而起,围困了王祖道所设立

从“九龙”到“感恩”,再从“昌感”到“东方”,海南岛西南部的东方市已经走过了2000多个春秋——

“东方”的由来和变迁

本报记者 陈耿 特约记者 卞王玉珏

西汉九龙县故地上设立了“感恩县”,这一名称一直到民国期间还在沿用。

1949年12月,海南岛西部的昌江、感恩二县合并为“昌感县”。1952年4月,东方(小)县诞生,这时昌感县仍存在;1958年12月,东方(小)县、昌感县和白沙县合并为东方(大)县;1959年东方县城从东方镇迁移到八所镇。

1961年5月东方(大)县又分为东方、昌江、白沙三县;1987年12月东方县改名为东方黎族自治县;1997年3月撤县设市,东方黎族自治县改称东方市,此时东方镇才更名为东河镇。

的“新王安军”,杀了不少官吏。

王祖道回到京城后,还是谎话不断,声称“黎人伐木助役”,待到皇帝下诏询问具体情况时,他却无言以对。但由于受到蔡京的庇护,王祖道没有被从重处分,而是得以出任福州知州,不久又被召回京师任刑部尚书。大观四年,王祖道死后2年,刚上任的宰相张商英追究了他在广西时妄言拓地的罪行,追贬他为某军的“节度副使”,但蔡京再度辅政后,又恢复了王祖道的名誉,只是他所创立的州县已经不复存在,“镇州”维持4年之后,也于政和元年(1111年)正式被废除。

东方明明位于海南岛的西部,为何名为“东方”呢?记者为此采访了从事海南地名研究多年的海南师大刘剑三教授。原来,在东方市东部山区的东河镇,有三个黎族村落——东方村、中方村(古镇州就在其附近)和西方村,“方”在当地黎语中是“村”的意思。

1952年,东方(小)县成立时,县城设在东方镇(今东河镇)的东方村附近,县名正是因为“东方村”而得名。

由于“东方”是黎语地名,因此它的实际意义与地理位置没有什么直接关系,巧合的只是,东方村倒是位于东方市东部山区。